

走自主发展之路

——争论中的“中国学派”

任 晓

内容提要 建设国际关系学的“中国学派”不仅可能而且必要。中国崛起已经并将继续对 21 世纪的世界政治和经济产生重大的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中国式国际关系理论的产生。中国的思想、哲学、文化为“中国学派”的产生提供了必要的知识资源。中国学界对“中国学派”国际关系学理论的探索,表明了中国学人的自信心和“成为知识的生产者”的志向。

关键词 国际关系学 中国学派 自主发展

近些年来,走“自主创新”之路,建设创新型国家,在中国的科学技术领域中已经被确立为一种主导思想,其意义将是十分深远的。进入 21 世纪后不久,国家科技主管部门就已阐明,加强原始创新是我国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原始性创新主要是指新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集中体现在基础研究和战略高技术研究方面。目前我国产业发展很多还是沿袭产业技术梯队转移的模式,技术发展也是跟踪模仿为主。这种状况必须改变。^①十七大提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这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是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2008 年 6 月,胡锦涛主席进一步指出,要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发展科学技术的战略基点、作为调整产业结构和转变发展方式的中心环节,把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面向未来的重大战略选择。^②

以上对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整体状况的判断及所提出的主要变革路径,几乎完

* 任晓: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邮编:200433)

① 陆正明:《加强原始创新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科技部部长徐冠华谈原始创新》,《文汇报》2001 年 12 月 20 日。

② 胡锦涛:《在中国科学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九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8 年 6 月 23 日。

全适用于包括国际关系学在内的中国社会科学的研究,也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

主张自主发展中国国际关系学,建设“中国学派”,是并不讨巧的。这是因为,有人会讥之以“喊口号”。过去我们有过很多口号,“喊口号”当然不是什么正面的评价。有的则干脆说,请“拿给我看看”,这或许会使提倡者无言以对,但这是否就意味着作为一个个体的学者和作为一个群体的我们就不应该谈国际关系学的“自主创新”或“中国学派”了呢?笔者并不这么看。学术乃天下公器,任何人都可以就某一问题发表意见和看法,包括这里所讨论的问题,哪怕他(或她)自身并未或尚未做出创新性的工作。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30多年,从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来看,30多年前一个需要“尽快补课”(邓小平语)的学科“世界政治”,即国际关系学,也已经发展到了一个自省、反思与前瞻的阶段。大约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国际关系学界一直在不间断地回顾和反思自身的状况和成败得失,这主要反映在重要学术会议的讨论和有关学术期刊文章中。^①福特基金会驻华代表处也曾经约请三位中美学者对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状况进行了评估,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国际关系研究(1995—2005)》一书等。^②因此,这看来是一个为国内国外学界广泛关注的问题。就外部而言,这种关注是中国关注世界的一部分,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这牵涉到中国如何看待世界以及与世界的关系。

这些评估、反思和讨论各有侧重,看法也不完全一致,但它们反映了中国国际关系学自觉程度的提高。在笔者看来,这一动向中最有意义和价值的,或许是围绕是否应建设或形成国际关系理论(或研究)的“中国学派”所展开的讨论。一段时间以来,这一讨论从开始时孤独的呼吁,逐渐得到了更多从业人员的赞同,同时也存在各种怀疑和保留。2004年12月在上海举行的全国国际关系理论讨论会,倡导“创建中国理论,构建中国学派”。若从1987年、1998年和2004年先后在上海

^① 按照发表的时间先后顺序,这些文章主要是:倪世雄、许嘉:《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回顾与反思》,《欧洲》1997年第6期;任晓:《国际问题研究断想》,《国际观察》1998年第4期;王逸舟:《中国国际政治理论研究的几个问题》,《欧洲》1998年第2—3期;俞正梁、陈玉刚:《中国国际关系和国际关系理论20年》,《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秦亚青:《国际关系学和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亚洲评论》1999年春夏号;苏长和:《中国国际关系学:问题与研究方向》,《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1期;任晓:《理论与国际关系理论:一些思考》,《欧洲》2000年第4期;秦亚青:《实证主义与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香港社会科学学报》2001年春夏号;石斌:《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式探索”的几个基本问题》,《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5期。任晓:《国际关系学不能没有人文底蕴》,《国际政治研究》2005年第4期;鲁鹏:《创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四种途径的分析与评价》,《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6期。

^② 王逸舟主编:《中国国际关系研究(1995—2005)》,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召开的三次全国性国际关系理论讨论会看,可以发现,2004年会议所倡导的,尽管并非首次提出,也可算是国际关系学在中国发展的重要事件之一。

有必要一提的是,在此倡议出现之前,曾经有过是否应提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学的争论。1987年,时任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总干事的宦乡在上海国际关系理论讨论会上就曾提到应“建立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①以后的提倡者以北京大学教授梁守德为代表,他从1990年代初开始就主张中国国际政治学理论建设应突出“中国特色”。根据他的解释,在理论建设中突出“特色”,不仅是承认个性和多样性,而且是重视开拓性,追求杰出性。理论建设中的求实创新和更新发展,就是“特色”杰出性的表现和要求。^②他后来又对“中国特色”的涵义加以说明,称“国际政治学的中国特色,指的是立足中国,面向世界,从中国的角度研究国际政治演变和发展的客观规律。”同时,又表明了强调中国特色的目的,“在于通过独立自主的研究,全面、准确地揭示国际政治的本来面目,完整建设好自己的国际政治学。”^③

怀疑者则认为,这或多或少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口号的套用。有的则认为中国人研究国际关系,是一定会有中国特色的,因而无需特别这样提倡。王逸舟“倾向于现阶段少讲或尽量不讲”,理由很简单,“我们迄今仍然谈不上对作为一门学科的国际政治学有多少贡献”。现阶段不宜多宣传“特色”的另一原因是,在经历了长时间的泛政治化之后,中国人在经济社会生活中都在淡化意识形态,国际政治研究也应当这样,要把意识形态追求与国家利益追求、对策分析与学理探讨、政见分歧与学理分歧区别开来,这样才有助于研究的深入和学术气氛的培养。^④

如果说,围绕“中国特色”问题的这一争论还比较空泛的话,那么,“中国学派”论的提出和阐发,明显比“中国特色”论在主观上更自觉,在内容上更充实,较之从前更有底气了。

较早提出应建设“中国学派国际关系理论”的主张,见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梅然2000年发表于《国际政治研究》和笔者同年8月发表于《欧洲》杂志的文章中。梅然在文章中写道,“我认为,中国的国际政治理论研究者应力求使自己的研究体现出创造性和独立性,以求建立‘国际政治学的中国学派’。”打出“中国牌”,可以凸现出当前全球国际政治学界的不合理状况,要强调对这种状况进行变

① 宦乡:《关于建立国际关系学的几个问题》,见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编:《国际关系理论初探》,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② 梁守德:《国际政治学在中国:再谈国际政治学理论的“中国特色”》,《国际政治研究》1997年第1期。

③ 梁守德等:《国际政治学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1—33页。

④ 王逸舟:《写在前面》,《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12页。

革的意义,显示出中国学者参与这场变革的勇气。……在其他国家的国际政治研究被美国的研究“边缘化”的今天,这样做就是要变“单一中心”为“多中心”。^①笔者则指出,中国的学者一定要有一种志向,一种创新意识,要致力于建设中国人自己的理论观点和理论主张,进而至于理论系统,因此之故,比较赞成“形成中国学派的国际关系理论”的说法。文章认为,“建设中国学派的国际关系理论是可以谨慎乐观的。建立中国的理论,并不是刻意追求与西方理论的对立,为了求不同而不同,而是说中国人要有独立思考的精神,不要拾人牙慧;要有自己的学说,不要总是跟着别人走。一言以蔽之,要有我们中国人的理论贡献。”^②

2002年9月,外交学院教授秦亚青为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国际关系理论前沿译丛”写了一篇总序。他写道,“希望这套译丛能够起到他山之石的作用,使我国国际关系学界的同仁通过借鉴、思考和批判,提出原创性的国际关系理论,建立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中的中国学派。”^③也明确提出了建立中国学派的主张。

与之较接近的,还有人主张“本土化”,认为“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本土化之关键在于提出符合中国国家核心利益的国际关系的系统解释。……中国本土化的国际关系理论,在一定意义上讲,就是要把中国经济发展必然形成的中华民族的复兴与世界的合作和冲突联系起来。……中国理论不是领导人‘语录’的注释,也不是对中国外交政策‘卡通式’的图解,而是科学范式推导的结果,或者是在讲‘历史故事’过程中有意但又不露痕迹地流露出来的启示。我认为这才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最为核心的要旨和形式上的要求。”^④这里强调了本土化了的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不是什么”和“是什么”,特别指出必须克服或超越过去那种“注释”和“图解”。问题在于,“本土化”是何涵义,该文似乎并未有进一步的论述。

迄今为止对“中国学派”问题进行了最系统阐发的是秦亚青,他也是比较乐观的一位学者,认为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生成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⑤他的理由是,首先,中国学派的产生是可能的,因为社会理论有着天生的和必然的本土性,也就是说,社会理论从本质上说必然是依托地缘文化的。这与所谓的本土化不完全一样。社会理论的本土意识和本土特征强调理论是在本文化中诞生的,在与其他文化的交流融合中发展起来并获得普适性。其次,中国学派有着可以汲取营养的三大思想渊源,即天下观念和朝贡体系的实践;近现代革命思想和实践;改革开放思想和实践。第三,中国学派产生不仅可能,而且必然。150多年来,中

① 梅然:《该不该有国际政治理论的中国学派:兼评美国的国际政治理论》,《国际政治研究》2000年第1期。

② 任晓:《理论与国际关系理论:一些思考》,《欧洲》2000年第4期。

③ 见秦亚青:《总序》,见北京大学出版社“国际关系理论前沿译丛”各书。

④ 李滨:《国际关系理论与本土化问题》,《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4期。

⑤ 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生成的可能和必然》,《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3期。

国相对于国际体系的最大问题是认同困境。现在,中国的迅速发展、重大的社会转型、深刻的观念变化使我们第一次开始比较成功地解决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问题。围绕中国与国际体系关系的根本性辩论和实践必然会导致中国学派的生成。^①

1990年代以来中国国际关系学界自主意识的增强,是与对英国学派的关注,以及对美国国际关系学之影响的某种反思有关的。近些年来,有不少人意识到美国的理论、美国的产品(甚至美国的思维方式)在中国已经得到广泛地引进、翻译和传播,在中国产生了广泛地影响。在很大程度上,美国的这种影响是不可避免的。美国国际关系学者人数之多、学术期刊之众、产品之丰富,外国人到美国大学留学或进行学术交流的机会之多,还有很重要的一点,资金来源之丰沛,都是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无法比拟的。因此,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和流派对世界上的很多国家都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是不足为奇的,中国自也不例外。美国的影响经由多种途径产生和发挥,而这恐怕是一个必经的、少不了的阶段。

另一方面,中国毕竟又不同于韩国和台湾等国家或地区。^②作为一个大国,中国有丰富、深厚的中华文化和悠久的历史,更具有自己的文化自觉和学术自觉。相应地,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一些国际关系学者对美国巨大的影响也产生了一种警觉。大约与此同时,中国学者较前更多地接触到了英国学派的作品和思想,并获得了不少启发。赫德利·布尔、马丁·怀特、巴里·布赞等人的著述在中国先后引起了注意。中国学界认识到,在美国之外还产生了这么优秀的研究成果,其质量和水平绝不逊色于美国的产品。这样,英国学派的主要著作随后被译成中文,包括《无政府社会》、《权力政治》、《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及稍早前 R. J. 文森特的《人权与国际关系》等。^③此外,南京大学石斌等学者对英国学派进行系统地研究,这些论文集中地发表于《欧洲研究》杂志,后成书出版。^④英国学派的人文底蕴、历史视角受到了相当一部分中国学者的激赏,这种研究还在持续进行之中。

既然可以有国际关系研究的“英国学派”,为什么不能有“中国学派”?这似乎是合逻辑的一种想法,也是提出“中国学派”论的背景之一。

与此同时,中国学界既认识到“美国重心”的存在,又对此存在着某种警觉,这

① 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生成的可能和必然》,《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3期。

② 比如,2006年4月2日在天津南开大学举行的“中国学者对话卡赞斯坦”研讨会上,卡氏直称韩国为(美国或西方的)“思想殖民地”。

③ 参见[英]赫德利·布尔:《无政府社会》,张小明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英]马丁·怀特等编:《权力政治》,宋爱群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英]巴里·布赞、理查德·利特尔:《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刘德斌主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美]R. J. 文森特:《人权与国际关系》,凌迪等译,北京: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

④ 陈志瑞、周桂银、石斌主编:《开放的国际社会:国际关系研究中的英国学派》,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是“中国学派”论产生的另一个背景。例如,王逸舟提及“陈乐民先生曾在许多场合批评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一个现象,那就是现阶段美国的影响太大甚至成为主导性的东西,对其他地区如欧洲了解、借鉴不够。”王本人承认这一点,因而提出了“如何超越美国中心”的问题,指出“这是努力的方向,不论是否现在超越得了,但要有意识这样做。”^①总体而言,“美国的东西太多”似乎是中国学者一个颇为普遍的看法。假如一味去追逐新发展,那就会永远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因此中国学人也自然地提出了“国际关系理论怎样建立中国自己的视角、自己的风格、自己的语言”^②等问题。

随着对一些重要问题展开讨论和研究,关于“中国学派”的探讨正趋向于深入。这些重要问题包括什么是“中国学派”、寻找核心问题、科学与人文的取向、中国哲学与文化的支援等。

二、探索中的“中国学派”的国际关系理论所涉及的若干问题

(一) 何谓“中国学派”、是否需要“中国学派”?

什么是“中国学派”?在庞中英看来,“中国(中华)学派”是指有中国特性的国际关系理论的总称,并非指单一的一个学派。也就是说,在中国学派内,本身可以有两个或多个学派。国际社会理论启发人们,追求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中华)学派”也许不是遥不可及的。他并问道:“中国有自己的悠久政治思想与哲学历史,为什么不能依据这样丰厚的历史积淀搞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③这就是说,中国人建设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是具备条件的,具有可依据的丰厚资源,即中国的哲学、思想和历史。

那么,中国如何建设自己的理论?经由什么途径进行?庞进而提出“开放式的自主发展”说。依照其解释,开放是为了学习别人的方法、概念、知识,是为了参与世界性的对话与交流,获得尽可能多的国际承认,把中国人的观点扩散开去。自主发展是本,把中国的政治思想、社会科学传统、观念、历史经验、东亚地区国际关系的历史和现实等结合进国际关系理论思考中,这将改变西方理论占主体的世界

^① 王逸舟:《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对成就与缺失的几点感受》,《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4期。原为2002年12月在《世界经济与政治》编辑部于北京召开的“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比较与借鉴”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② 同上。

^③ 庞中英:《开放式的自主发展:对英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一项观察——思考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方向》,《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6期,第25页。

国际关系理论局面。^①

类似的观点认为,中国理论的发展本身就需要通过形成不同学派以及学派之间的交流与争鸣来实现。上海交通大学俞正梁教授提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建设不是建构一种统一的或唯一的国际关系理论。其发展与繁荣,取决于不同学派的形成、切磋与争鸣。“所谓‘学派’,主要是指某一特定研究群体,他们研究旨趣相似,理论导向相同,思想倾向相仿,学术风格相近。它是由于学说师承不同、观察事物视角不同,以及对现实与趋势判断不同而形成的学术派别。学派是激活学术研究所必不可少的,学派之间的互动引发理论创新,学派对于传承学术精粹,凝炼学术传统,铸造学术辉煌,造就学术大师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② 俞进一步说,没有学派,就不可能有大师。

而在鲁鹏看来,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还无法说明:中国学派或者说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为何需要、何以成为可能。^③ 这个问题涉及如何理解理论的普遍有效性问题,它与社会科学领域一直存在的两种观点相关。第一种观点是一元论,认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同属科学,从根本上说,二者没有区别。第二种观点是二元论,认为自然世界和社会世界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其根本不同就在于社会世界研究的主体和客体都是人。既然是人做研究,就不可能价值中立。持一元论观点的人认为国际关系理论是没有国界的,凡是可以称之为理论的东西都是普适的,因为规律的存在是不会因时间和空间而发生变化的。于是,任何试图创立国别学派的努力都被视为徒劳。持二元论观点的人则认为,自然科学理论无国别之分,但社会科学理论可以有国别之分。因为在社会科学领域,“理解”是重要的认识方式,而“理解”恰恰是受到地缘文化限定的。地缘、文化、历史、思维方式和集体记忆等因素的差异会导致人的理解产生差异。因此,国际关系理论的国别标签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④ 在相关中国学者的论述中,秦亚青(及笔者本人)都持二元论的立场,而阎学通等则持一元论的看法,在他看来,国际关系理论都是普世性的,它们本身不具有国家性,因此创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目标是无法实现的。^⑤ 这是一种比较极端的看法。理论当然是对普遍现象加以解释和说明的通则,但在进行理论化的努力时,无论如何还有一个主观努力问题,这跟创建者来自什么国家绝非无关,他/她所处的国别环境和生存条件一定会影响其理论建构的具体形态和具体内容,这种状况跟自然科学有很大的不同。

① 庞中英:《开放式的自主发展:对英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一项观察——思考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方向》,《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6期,第25页。

② 俞正梁:《序言》,见郭树勇主编:《国际关系:呼唤中国理论》,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③ 鲁鹏:《创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四种途径的分析与评价》,《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6期。

④ 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生成的可能和必然》,《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3期。

⑤ 阎学通:《国际关系理论是普世性的》,《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2期。

因此,对于“中国学派为何需要”之问题的回答,就是要求中国人不满足于现状、“成为知识的生产者”这一追求。^① 根据王正毅的说法,与国际体系在政治和经济上出现的核心区(国家)和边缘区(国家)的结构相对应,国际体系在知识上也相应地出现核心区(国家)和边缘区(国家)的结构。所谓知识领域的核心区,是指那些创造概念和范畴的地区,而边缘区自然是指那些消费核心区创造出来的概念和范畴的国家和地区。但这不是绝对的,经过学者们的努力,处于边缘区的国家和地区也能成为知识的生产者。^② 正是由于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对现状的不满意,正是要改变知识和学术的消费与生产之间明显的不平衡状况,进而成为知识的生产者,才催生了对中国理论和“中国学派”的呼唤。

俞正梁指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和建设需要有开拓者精神,需要有冲破原有的思维定势和理论框架的勇气和胆识。基于这种认识和自己的探索,他对西方理论中的国际“无政府状态”假定提出了重大质疑,认为自从民族国家诞生以来,事实上国际秩序一直处于进化之中,国际社会一直致力于对民族国家行为的规范,这种规范的努力包括国际法、各种国际协定和国际组织。三大新发展——科技革命、资讯革命和全球化引起的全球价值认同,虽然尚未从根本上克服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但是却使其有序性不仅有了大幅增长,还在质的意义上开始了重大转变。换言之,在国际政治向全球政治转变之际,国际无政府状态发生了具有深远意义的重大变化。体系不再是由完全独立的行为体并列组合而成,体系与其构成部分之间、各种行为体之间有着非常复杂的相互作用,既相互依存、相互渗透,又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从而形成无序与有序相结合的立体网路结构。正因如此,西方主流学派关于国际无政府状态内在总逻辑的基本假定失效。^③ 这是大胆而有理论勇气的论述和论断。由此而来的一个问题,是“破”了之后还需“立”,在“破”与“立”之间,该树立的是什么?新的理论范式的理论起点应是什么?俞正梁等对此所给出的是全球共治范式。这一范式的核心原则是全球共治,即全球多边主义合作基础上的共同治理。根据这一范式,以国家为中心已让位于以国家合作共治为重心,其目的是动员全球范围内的力量,共同参加全球事务的管理,解决全球社会管理能力严重不足的根本问题,实现权威从国家独占到与社会共享的转移。^④ 这一论点如能成立,将有望在未来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① 王正毅:《成为知识的生产者》,《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3期。

② 同上。

③ 俞正梁等:《二十一世纪全球政治范式研究》,(台湾)雁山出版社2003年版,第225—226页。

④ 俞正梁、陈玉刚:《全球共治范式初探》,参见郭树勇主编:《国际关系:呼唤中国理论》,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4页。

(二) “问题”与“核心问题”

中国理论的创建要求提出自己原创性的问题,这个或这些“问题”是什么?中国学者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

在1998年发表的一篇考察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状况的文章中,笔者曾批评在研究过程中,有时“连问题也要从国外引进”。^①苏长和进了一步,认为理论的建设来自于对问题的研究,也就是说,理论是从问题中来的。作为一名科学研究者,最重要的是发现问题,或者说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尽管发现问题的人不一定能够解决它,但是发现的问题本身可以引领和带动后面的研究。^②资中筠在同一期《世界经济与政治》的卷首语恰为“理论创新从研究新问题中来”,指出“比较现实而理想的境界是食洋而化,作为自己的营养,然后要把它撇开,自己直接面向现实,跟实践打交道,得出自己的结论来”。^③资中筠一向认为,西方的有些“国际关系理论”,是脱离实际,纯粹只是在大学里自我循环。这些“理论”经常从概念到概念,发明许多新名词,故作高深,实际上意义不大。故她所说的“新问题”,是来自于实际的新问题。

大体与此同时,庞中英提出,要考虑确实可能导致出现所谓一两个、甚至多个“中国学派”诞生的核心概念问题。中国学者能否依据一些自己提出的概念发展出一套全球化下中国对于国际关系的认识体系?^④从“问题”到“问题意识”再到“核心概念”,已经显示出了一条轨迹,显示出了中国的研究者对这一重要课题的思考在逐步深入,而且还在引起进一步的思考和讨论。在张志洲看来,问题意识与学术自觉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建设的基本前提。中国国际关系理论要想取得发展,必须强化自己的问题意识和提高学术自觉性。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学术自觉性的提高,必将使其重新认识中国自己“本土”的国际关系理论资源,树立对中国文化的自信心。^⑤

到目前为止,最系统地阐述了这一问题的是秦亚青。他指出,中国国际关系学在过去20年里发展迅速,有了学科和学派的自觉,但作为学科重要标志的原创性理论和理论学派却依然没有形成。在他看来,中国原创性国际关系理论需要具备三个基本特征:第一,它是基于局部的(中国的)思想文化、历史传统和现实经验而产生的;第二,它具有通则性特征,亦即具有超出局部传统和经验的普适性;第三,

① 任晓:《国际问题研究断想》,《国际观察》(上海)1998年第4期。记得1998年10月在上海举行的“全国国际关系理论讨论会”期间,时殷弘教授对此表示认同,并认为可就此专门写一篇文章。

② 苏长和:《问题与思想:再谈国际关系研究在中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3期,第29页。

③ 资中筠:《理论创新从研究新问题中来》,《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3期,第1页。

④ 庞中英:《开放式的自主发展》,《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6期。

⑤ 张志洲:《问题意识与学术自觉: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建设的基本前提》,参见郭树勇主编:《国际关系:呼唤中国理论》,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81—189页。

它的核心理论假定具有与其他国际关系理论不可通约的性质。依照这三条标准来衡量,目前仍然没有可以称之为学派的原创性理论。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理论核心问题的缺失。^① 他所说的中国学派重学理方面的意义,是既符合普遍理论标准,又具有中国视角的理论;既在一定时空范畴内、在宏观层面上具有普适性的意义,又在微观层面上表现了属于中国的实践经验和理论建构路径。它的基本辨别标准应该是具有与现有理论不可通约的核心假定。他指出,原创性理论必须超越单纯的理论验证,它是根据局部经验生成的假定、假设和概念,具有不同于其他理论的话语特征,并导向通则性理论体系。^②

那么,什么可以成为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核心理论问题?秦亚青认为,中国和平融入国际社会可以是这样一个核心问题。对于上升大国的和平社会化过程问题,现实主义基本持否定态度,而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在这方面都没有真正的经验性研究,所以这方面的理论基本上是空白。而中国恰恰是一个上升大国和平社会化的最佳个案。将中国和平融入国际社会作为核心问题并对其加以理论化,就是将一个上升的世界性社会主义大国和平社会化的过程加以理论化。所以,中国是否可以和平融入,什么条件可以促成中国的和平融入,国际社会负责任的成员对于中国具有什么含义——围绕上升大国和平融入国际社会这一核心问题所产生的这些具体研究问题,应该构成成为中国国际关系研究议程的重要部分。^③ 由此,秦亚青回答了中国学派的建设需要抓住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并进而提出了相应的研究议程,这就把关于“问题”与“核心问题”的讨论明显推进了一步。鉴于中国崛起已经并将继续对 21 世纪的世界政治和经济产生重大的影响,由此已经产生了对于中国的一系列问题。无论是否视之为“核心问题”,围绕这一重大发展而展开的研究,应该能够推动中国式理论的产生。

(三) 科学与人文

科学与人文的选择,过去曾激起过热烈的争论,^④也还在继续引起人们的讨论。那么,科学与人文,对于中国学派的建设又具有何种意义?在这一问题上,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出现了少有的论争,比较集中地体现于 2003 年 9 月 20 日在北京召开的“国际关系研究方法”学术研讨会中。这次会议是由《中国社会科学》和《世界经济与政治》两个杂志社联合召开的。清华大学阎学通是主张科学方法的代表,他认为,要提高中国学术界对国际关系认识的准确程度,现在还没有比科学方

^① 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与中国学派的生成》,《中国社会科学》2005 年第 3 期,第 165—176 页。这是一篇十分重要的论文,相信还会引发更多的讨论。

^② 同上,第 166 页。

^③ 同上,第 175—176 页。

^④ [英]C. P. 斯诺:《两种文化》,陈克艰、秦小虎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3 年版。

法更有效的方法。什么是“科学方法”？在他看来，将科学方法与其他研究方法区别开来的标准是程序性、实证性和共同规则。科学研究方法的程序至少要包括发现问题、提出假设、概念操作化、实证检验、得出结论几个环节。^①“科学研究方法有很大的局限性，它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科学的方法可以解决很多其他研究方法所不能解决的问题。”^②南开大学张睿壮也持类似看法，认为以中国目前的状况，更需要提倡科学方法，尽管这并不意味着只有科学方法才是唯一可行的。实证性的科学研究方法采用类似自然科学的研究方式，强调以经验证据为理论的唯一检验尺度，这样一来就有了一个共同的客观标准，有利于问题的探讨。^③

笔者认为，在国际研究中，包括“科学方法”在内的不同研究方法有其各自的作用，也有各自的局限性。别的方法（如比较历史分析）和“科学方法”相比，不见得就不如“科学方法”。因此不赞成“上华山只有一条路”式的看法，提倡方法论上的多样和宽容。此外，方法论上的多样绝不会阻碍国际关系研究的开展，相反只会促进国际关系学的发展和繁荣。就个人而言，笔者更愿意提倡采用比较历史分析的方法。^④这次会议，是科学与人文两种取向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一次有益对话和交锋。^⑤

秦亚青则主张“第三种文化”，努力寻求国际关系研究中科学与人文的契合。他认为，关于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两种方法，在西方有很多争论，在中国现在也出现了，这是好事。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方法论争论，就没有学科发展。自 1990 年代中期以来，一些中国学者针对当时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仍然混同于政策研究和基本无方法论可言的状态，开始强调以科学实在论为基础的研究方法，并努力推进这一方法的应用。他特别指出，实际上科学派和人文派的方法在某些方面是完全可以整合的。这就是他主张的开辟一条第三种文化的道路：寻求人文与科学的契合。对于中国的国际关系学来说，科学与人文的融合似乎更是一条有意义的中间道路。^⑥在“人文”这一边，笔者认为社会科学研究不仅需要，而且不能没有人文底蕴。中国的国际关系学同样如此。“科学化”的主张受美国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影响很深，但实际上行为主义存在相当严重的缺陷。由于追求“纯”科学，很多研究走入了“非历史”的歧途。历史不见了，无限丰富多样的语言、文化、宗教、社会现

① 会后形成的书面文字见阎学通：《国际关系研究中使用科学方法的意义》，《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 年第 1 期，相比而言，发言的实际内容和调子要更激烈一些。阎还将其发起创办的刊物称为《国际政治科学》，英文名称为 Scienc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在国际研究中提倡“科学”，其意甚明。后应英文版出版者的建议，改为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② 阎学通：《国际关系研究中使用科学方法的意义》，《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 年第 1 期。

③ 张睿壮：《与发达国家对比中看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差距》，《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 年第 1 期。

④ 任晓：《讲究方法，不惟方法》，《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 年第 1 期。

⑤ 与会的秦亚青教授观察说，在美国国际关系学中曾经出现过的科学与人文之争，在中国也出现了。

⑥ 秦亚青：《第三种文化：国际关系研究中科学与人文的契合》，《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 年第 1 期。

象在科学化的口号和表象下消失了,人的色彩斑斓的活动被削足适履地归结为几条博弈定律。然而,一切人文社会科学,归根到底是“人学”,没有了人文情怀的社会科学,历史归于无形,意义可能消失。毫无疑问,人文底蕴也是国际关系理论建设所不可或缺的。没有人文底蕴而能有杰出成果的,看来可能性甚小。^①

(四) 中国文化思想能够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提供什么资源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建设,需要有一定的理论来源和思想资源,有的中国学者归纳了一些有利条件,有的则提出了四大理论来源说,^②但不管如何概括,无人否认,建设中国理论和创建中国学派不能没有中国思想、哲学、文化以为奥援,不可不从中汲取营养,它甚至应是一座可能的宏伟大厦的基础。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在这一点上是有清楚共识的,例如王军指出,“迫切的是,当中国学者不断追问‘中国学派’和自己的研究特点时,传统资源是不可或缺的,而且存在着如何挖掘传统资源的艰巨任务。”^③同时也指出了一个事实,“近代以来,在中国的政治与文化实践中,传统文化在相当长时间内处于被忽视和搁置状态,传统话语、思想虽还在影响着中国(人),但传统叙事的合法性已大大削弱。”^④由于传统的断裂,在中国国际关系研究者的学术熏陶和知识积累中,中国思想文化的知识准备和功底相当薄弱,这是一个令人相当窘迫的现象。

无论如何,中国学界需要在这方面做出扎扎实实的初始性研究,也的确已经出现了一些颇有意义的工作。早在十年前,俞正梁就曾撰文讨论中华文化与国际政治新秩序问题,较早地提出了一些新鲜的见解,其中包括:第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和价值理想是重视和追求事物的和谐、均衡与稳定,这恰恰是国际政治新秩序所要达到的持久和平、均衡发展、长期稳定的终极目标。这一目标的核心是和谐。第二,国际政治新秩序,首先是指国际社会公正、合理的基本原则及其良性的运作机制与状况,这是构筑国际社会和谐的保证。而中国的和合思想文化可为此提供极为重要的思想资源。贵和思想追求对立的统一,它在承认差异、承认矛盾的前提下,用中庸之道来防止斗争激化,促成矛盾的转化与解决,使双方达到协调与均衡。第三,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建立,还有赖于国际行为尤其是国际政治行为合

① 任晓:《国际关系学不能没有人文底蕴》,《国际政治研究》2005年第4期。

② 任晓概括了五个有利的主客观条件,即中国博大丰厚的文化传统、当代中国的外交实践提供了丰富的养料和动力、了解并在一定程度上消化了外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已经形成了一支研究队伍,以及中国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见其《理论、国际关系理论及其他(代序)》,任晓编:《国际关系理论新视野》,北京:长征出版社2001年版。俞正梁认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创立有四大理论来源: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关系的理论、新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及其实践经验、中华文化精粹,以及外国国际关系理论”,俞正梁:《序言》,见郭树勇主编:《国际关系:呼唤中国理论》,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③ 王军:《大国复兴与中国传统资源的发掘》,《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5期。

④ 同上。

乎规范与准则,这同样是达到天下普遍和合境界的保证。中华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可相应地为国家行为的准则提供规范。^①这一研究可说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探讨中国文化可如何补益国际关系的先声之一。

在另一方面,对中国古代外交思想持之以恒地加以研究,较有代表性的是北大的叶自成,他撰述了《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外交思想》一书在香港出版。^②作为较早从国际政治的视角较为深入地研究中国古代外交思想的学者,叶试图总结有中国特色的外交经验,尝试从学理上分析当代中国外交实践中提出的原则与理念。新近的一项工作则是阎学通、徐进选编了《中国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选读》一书,^③其初衷在于“如果能从中国古代先贤的政治思想中汲取营养,将可以丰富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编者的话)。可见,即使是提倡“科学方法”最力的中国学者,也转而重视似乎不那么“科学”的古代中国思想。因此,共识是存在的,即应该和必须对中国极为丰富的外交思想和实践进行更为深入的总结并使之系统化、理论化。没有对中国外交的历史尤其是对中国外交思想史的全面的总结,不可能产生真正的有中国特色的外交思想和国际政治学理论。^④春秋战国时期的外交思想是中国传统外交文化的基石,直到今天还深深地影响着中国的外交理念和政策,这种影响是全方位、多方面的。^⑤

现在的问题是,很大程度上由于学术训练的原因,中国思想文化的知识准备和储存,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普遍不足。多年来,由于这一学科是研究外国和国际事务,使得人们较容易忽略对本国思想文化的研究和把握。正因如此,中国学者虽然已普遍认识到把握中国思想文化的重要性,但补课的进行和研究的开展显然需要一个过程,故这方面的进步和发展还不明显。

不过,现实生活中的新发展正在对此产生推力。“和谐世界”倡议的提出,就是这样一个新的动力。2005年4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纪念万隆会议召开50周年的亚非峰会上,首次提出共建和谐世界问题。同年9月15日,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他又发表了题为《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重要演讲。中国在国际上提出与国内建设“和谐社会”密切相关的建设“和谐世界”的主张,引起了中国学界颇为热烈的讨论及争论。很自然地,人们需要研究“和谐”的内涵、中华文化中“和”的思想以及它对于建设“和谐世界”具有什么样的意义,针对世界的种种不和谐及乱象能够有何种补正,等等。政府层面上对“和

① 俞正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国际政治新秩序》,《学习与探索》1996年第4期。

② 叶自成:《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外交思想》,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3年版。

③ 阎学通、徐进选:《中国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选读》,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④ 叶自成、庞珣:《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外交思想流派及其与西方的比较》,《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12期。

⑤ 叶自成、王日华:《春秋战国时期外交思想流派》,《国际政治科学》2006年第2期。

谐”作为一种价值的倡导,以及学术界的“国学热”,有望推动和促进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对本国思想文化的探究和思考,进而有可能对于围绕“中国学派”问题进行的探索产生某种积极的促进作用。

三、结 论

中国人应致力于建设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学说,这一努力方向已基本形成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一项共识,至于是否以“中国学派”为鹄的,则存在争论。无论如何,这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学术自觉程度日益增强的结果,表明了中国学人的自信心和“成为知识的生产者”的志向。

在中国,建设“中国学派”的讨论逐渐趋于深入,主要围绕着四个方面进行,即中国学派本身的可能和必要;这一努力所应确立的问题或核心问题是什么;科学与人文的论争,以及如何挖掘中国博大精深的思想文化资源以为支援。

与此同时,人们也认识到,“中国式探索”和中国学派的建设绝非一蹴而就,而是需要经过艰苦的努力才有可能逐步前进。理论创造是一项相对枯燥、抽象的工作,只有持之以恒的长时间的努力,才有可能产生真正的成果。